

达卡全市张灯结彩热烈欢迎刘主席访问

公众领袖盛赞巴中人民患难之交的友谊是持久的友谊

各报强调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巴中建立亲密友好关系

新华社达卡十四日电 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市民正在热情地为刘少奇主席前来东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而忙碌着。

在大街上，已经挂起了彩色缤纷的大型迎宾拱门，街道两旁挂起了巴中两国的国旗和绿红色的彩旗。公共的和私人的建筑物上装上了彩灯，使这个城市在晚上显出一片节日气氛。

出现在这个城市的一些标语用孟加拉文写着：“中国是我们的朋友，被压迫人民的朋友，正义的维护者。”“人民中国万岁”。

全巴基斯坦工人联合会成立了一个二十人的接待委员会，以便在刘少奇主席到达这里时给予他热烈欢迎。这个委员会由达卡市和郊区各工会组织的代表组成。

有许多人从东巴基斯坦北部城镇来到达卡。铁道管理部门已经调出专车来把迫切希望参加刘少奇主席的的人们从库来拉、米门辛格和卡附近的其它城镇送到卡。这个城市的电话局已经作了特别安排，以便在刘少奇主席访问期间发传真图片和挂长途电话。邮政部门也作了递送邮件的特别安排。

达卡的报纸正在紧张地准备在中国客人到达的那天出版增刊，介绍中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的成就。

新华社达卡十四日电 东巴基斯坦公众领袖和各阶层人民热情欢迎刘少奇主席在结束了对西巴基斯坦的访问之后，到东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

著名公众领袖阿卜杜勒·哈基姆汗·巴沙尼在一次集会上号召卡市民向中国人民的领袖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国人民在印度与锡兰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反对侵略战争的时候，坚决同巴基斯坦站在一起，而在当时，巴基斯坦的所谓朋友用一切办法帮助和鼓励印度侵略。他说，这应当使巴基斯坦人民知道，谁是他们的真心实意的朋友。

巴沙尼还热情地赞扬中国始终支持亚非国家被压迫人民的事业，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并且是正在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全世界人民受到鼓舞的源泉。他说：“我们伟大的友好邻邦的国家首脑即将访问东巴基斯坦，他应该受到与他相称的接待。”

据《巴基斯坦时报》报道，巴沙尼七日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巴基斯坦同中国的友谊是持久的友谊，因为这种友谊是两国八亿多人民的真诚愿望的顶点。

民族人民东巴基斯坦省工作委员会四月八日在达卡举行的一次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说，在巴基斯坦困难的时刻，中国政府和人民提供了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东巴基斯坦人民应该按照中国最好的传统

来接待这位来自伟大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从而加强巴中友好和亚非团结的事业。

达卡副专员纳齐尔也发表讲话，号召各界人民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

全巴基斯坦劳工联合会主席哈伊和总书记沙阿·阿卜杜勒·哈利姆十三日对报界发表谈话，号召东巴基斯坦工人给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领导人最热烈的欢迎。

东巴基斯坦机械大学中央学生会的负责人发表声明说，刘少奇主席的访问是“巴基斯坦的大光荣”。

一项号召人们热情欢迎刘少奇主席的声明说，在东巴基斯坦去年九月遭到背信弃义的侵略的时候，中国支持了巴基斯坦。中国领导人的来访“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来敞开我们的心表达我们的感激。”声明说：“这次欢迎可以显示我们的爱国心，显示一个伟大的民族对一个伟大的国家的感激，并且表示我们对帝国主义阴谋的不调和的仇恨。”

连日来，东巴基斯坦报纸纷纷发表社论，欢迎刘少奇主席即将到东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

《巴基斯坦日报》在社论中说：“巴中友谊不仅对相互间的利益是必要的，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也是必要的。在最近的民族危机中（指印度去年九月侵略巴基斯坦），这种友谊的深度和真诚得到了证明。”它还说：“有人对巴中友谊这种越来越大的力量感到不愉快，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确信这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自由报》的社论热烈赞扬刘少奇主席在访问西巴基斯坦期间发表的关于中巴友谊的谈话。社论说，巴基斯坦人民以感激的心情记住刘少奇主席的讲话，刘少奇主席说，如果巴基斯坦的独立和主权受到威胁，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帮助巴基斯坦。

社论说，巴中两国“都切望扩大合作的规模和领域。我们希望，刘主席的访问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

《信报》的社论说：“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地使亚非新国家陷于孤立，但是他们悲惨地失败了。他们无法阻挡巴基斯坦和中国建立亲密友好关系。由于巴中两国在国际上有着共同的目标，它们发展友好关系是很自然的。”社论说：中国说，如果巴基斯坦的主权遭受威胁，中国将站在巴基斯坦一边，我们相信他们的话。我们方面也能对主席保证，我们巴基斯坦人民在同他们的六亿五千万中国兄弟在共同的事业中站在一起。

新华社达卡十五日电 东巴基斯坦报纸十五日在显著的地位用巨大的篇幅，热情地欢迎刘少奇主席到东巴基斯坦省访问达卡继续对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并欢呼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

达卡的报纸刊登了中国贵宾的照片，发表了社论和介绍中国成就的文章。有的报纸还用了中文的标题：《欢迎贵宾》。《巴中友好万岁》。达卡孟加拉文报纸《信报》还在特别为这一天发行的增刊上登载了毛泽东主席的大照片和毛主席的一些语录。

达卡出版的《晨报》用中文刊登了一条标题：《欢迎贵宾抵达达卡》。这家报纸用英文和中文并排登载了一篇题为《友谊花开》的社论，盛赞中巴两国的友谊。这篇社论还用了内容全是关于中国的十六版增刊。许多特写文章和图片介绍了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和成就和中巴友谊发展的重大事件，此外还登载了毛泽东主席著名的诗《长征》和中国的木刻。

《晨报》的这篇社论说：“在千千万万欢腾热情地欢迎将在今天到达达卡的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的时候，人们的心都会高兴得跳起来。他们正好在孟加拉历新年的时候到达达卡，这是一个吉兆。这些可爱的中国朋友就要来到东巴基斯坦，哪里能有比这更好的新年礼物呢？在一年伊始的时候，哪里能有比这更能预示将要更幸福的未来呢？”

社论说：“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发表的中国—巴基斯坦联合公报强调指出：‘巴中友好不是权宜之计，是有牢固基础的。’”社论说：“系结着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纽带是强有力的，是牢不可破的。去年九月印度进攻我国神圣领土的时候，中国援助了这种种友谊的纽带就是锻铸的钢一样。”

社论说：“三月三十一日的联合公报还强调指出，‘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克什米尔争端应该同巴基斯坦和印度向克什米尔人民所保证的那样，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加以解决。’这是巴基斯坦绝对不会背弃的保证，为了荣誉，巴基斯坦必须履行这一保证。象中国一样，巴基斯坦认为，在根本原则问题上是不能妥协的。”

社论说：“刘少奇主席到巴基斯坦人民在反对印度侵略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气概表示了钦佩。由于这种钦佩是伟大的、英勇的中国人民的一位革命英雄表示的，它就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

社论说：“中国人在战争与和平中的英雄事迹，使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感到钦佩，对那些为反对暴政和侵略而斗争的人，是一个鼓舞的源泉。”

社论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这两句诗中流露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得中国人民能够渡过大河，攀登重兵把守的高山，创造出英勇顽强的不可思议的事迹。我们向中国人民致敬，他们表明，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人民前进，就连高山也要向人民的意志低头。”



四月十五日，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在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的陪同下，乘专机到达达卡，对东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中国客人受到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和东巴基斯坦省省督阿卜杜勒·穆奈姆·汗，以及达卡的几十万市民夹道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戈春江摄（传真照片）



一些达卡市民化装成非洲人，手持长矛和盾，跳着象征亚非人民团结和反帝事业必胜的非洲舞蹈，欢迎中国贵宾。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阿尔巴尼亚军队贯彻进一步革命化措施

普遍开展“模范连队”运动和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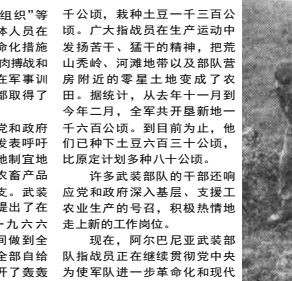
据新华社地拉那十四日电 本报记者报道：阿尔巴尼亚武装部队的指战员热烈拥护劳动党中央最近的公开信提出的革命化措施。保证要在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上做好全面准备，以保证祖国的安全和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劳动党和人民军领导机关的号召下，武装部队的全体人员普遍开展了“模范连队”运动。国防部订出了获得“模范连队”称号的四个主要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政治思想工作好；（二）军事技术训练好；（三）关心人的生活、粮食、肉类、蔬菜自给自足；（四）用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完成任务好。其中第一个条件是获得“模范连队”称号的首要条件。此外，全军还开展了“模范分队”、“一班一”、“模范青年组织”等运动。武装部队的全体人员在党中央提出的各项革命化措施的鼓舞下，苦练近战，肉搏战和夜战本领。许多部队在军事训练和组织纪律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在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发表呼吁书，号召全体军民因地制宜地大办农业生产，争取农业产品自给，以减少国家开支。武装部队的全体人员为此提出了在第四年五年计划（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期间做到全军粮食、肉类和蔬菜全部自给的奋斗目标，并且展开了竞赛激烈的生产运动。全军计划在五年计划期间开垦新地二万五千至三万公顷（每公顷合十五市亩），争取在今年开垦新地五千公顷，栽种土豆一千三百公顷。广大指战员在生产运动中发扬苦干、猛干的精神，把荒山秃岭、河滩地带以及部队营房附近的零星土地变成了农田。据统计，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全军共开垦新地一千六百公顷。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种下土豆六百三十公顷，比原定计划多种八十公顷。

许多武装部队的干部还响应党和政府深入基层、支援工农业生产的号召，积极热情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现在，阿尔巴尼亚武装部队指战员正在继续贯彻党中央为使军队进一步革命化和现代化而采取的各项措施，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以便为祖国的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大抓粮食生产的号召，向荒山开战，向秃岭要粮，新开了许多荒地，其中有不少位于海拔两千米的高山上。图为地拉那地区某部队正在开垦地的情景。

王仲智摄（新华社稿）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大抓粮食生产的号召，向荒山开战，向秃岭要粮，新开了许多荒地，其中有不少位于海拔两千米的高山上。图为地拉那地区某部队正在开垦地的情景。

王仲智摄（新华社稿）

中刚（布）签订文化合作协定执行计划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十四日电 中国和刚果（布）十四日在这里签订了两国文化合作协定一九六六年执行计划。

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团长、文化部副部长李琦和刚果（布）国民教育部长布里埃尔·贝图签署了这个计划。

李琦在签字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这标志着两国之间的文化合作的新发展。他强调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和刚果（布）人民将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肩作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贝图在讲话时说，刚果（布）和中国之间现有的文化合作今后必将进一步发展。他说，刚果（布）一直在为它的完全独立进行斗争，并且决心斗争到底。

出席签字仪式的，中国方面有中国驻刚果（布）大使周秋野和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刚果（布）方面有：国民教育部办公厅主任埃巴拉·多纳纳斯和外交部部长巴拉·阿德里斯等。

我大使向叙国家元首递交国书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十四日电 新任中国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陈旭十四日中午在这里向叙利亚国家元首努尔丁·阿塔西递交国书。

陈旭大使在递交国书时向叙利亚国家元首阿塔西转达了刘少奇主席对他和叙利亚人民的问候。

大使说，中国和叙利亚两国之间存在深厚的友谊。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民族独立和建设国家的共同斗争中一贯相互同情和支持。他说，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亚非人民团结反帝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

国家元首阿塔西在致答词时向刘少奇主席和中国人民问候。他说，中国和叙利亚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亚非人民争取解放、独立和统一的革命斗争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这支力量将粉碎侵略者和剥削者。他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家取得的辉煌胜利，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毛主席词《沁园春》（长沙）

伊拉克诗人译成阿拉伯文发表

新华社十四日讯 巴格达消息：伊拉克杂志《笔》一月号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词《沁园春》（长沙）的阿拉伯文译文。

这首词的译者是伊拉克诗人努曼·马希尔·卡纳尼。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向全体公民发出的呼吁书，以及党中央公开信的鼓舞下，阿尔巴尼亚许多工人、青年、学生和战士，掀起了一个超额的竞赛，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首都地拉那第一季度的工业生产计划超额完成了百分之二点三，首都其他几个大型工业企业如斯大林纺织联合工厂、恩维尔·霍查纺织厂、阿里·伊米德食品联合工厂以及十一月二十二日建筑公司等单位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恩维尔·霍查纺织厂今年前三个月的产量比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并增加了上月份去依靠进口的新产品。地拉那、普拉特、爱尔巴桑等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企业的绝大部分工厂企业也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向全体公民发出的呼吁书，以及党中央公开信的鼓舞下，阿尔巴尼亚许多工人、青年、学生和战士，掀起了一个超额的竞赛，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首都地拉那第一季度的工业生产计划超额完成了百分之二点三，首都其他几个大型工业企业如斯大林纺织联合工厂、恩维尔·霍查纺织厂、阿里·伊米德食品联合工厂以及十一月二十二日建筑公司等单位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恩维尔·霍查纺织厂今年前三个月的产量比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并增加了上月份去依靠进口的新产品。地拉那、普拉特、爱尔巴桑等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企业的绝大部分工厂企业也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

在前三个月的产量比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并增加了上月份去依靠进口的新产品。地拉那、普拉特、爱尔巴桑等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企业的绝大部分工厂企业也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

在前三个月的产量比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并增加了上月份去依靠进口的新产品。地拉那、普拉特、爱尔巴桑等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企业的绝大部分工厂企业也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

朝鲜保健事业取得很大成就

果树总面积比五年前增加百分之六十

新华社平壤十三日电 朝鲜全国医务工作者会议十一日和十二日在平壤举行。这次会议讨论了“改进和加强保健工作”的问题。保健相崔昌锡在会上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有一千七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根据崔昌锡的报告，最近十年，朝鲜卫生保健和治疗预防机构增加了两倍半，一九六五年医生的人数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了五点七倍。目前，每个里都设立了诊疗所，从中央到地方已建立起完整的保健工作体系。因此，去年每一千人的死亡率比一九五六年几乎减少了一半。

会议决定在一切部门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以便使卫生保健工作发展到更高的阶段。

社会主义国家公安体育组织第七届男子篮球比赛在京开幕

谢富治副总理接见各国代表团领队

据新华社十五日讯 社会主义国家公安体育组织第七届男子篮球比赛大会，今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幕。今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大会主席台后面，树立着参加这次比赛的七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旗。七时半，当阿尔巴尼亚内务部“狄纳莫”代表队、保加利亚“斯巴达克”代表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安全省体育指导委员会代表队、波兰“近卫军”代表队、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狄纳莫”体育俱乐部代表队、捷克斯洛伐克“红星”代表队和中国“前卫”代表队，以各国旗为先导，在乐曲声中先后走进北京工人体育馆比赛时，观众席上响起了有节奏的掌声。之后，少先队员向各国代表团献了花。公安部部长、中国“前卫”体育协会主任杨奇清致开幕词。他代表中国“前卫”体育协会向参加这次比赛的各国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预祝这次比赛圆满成功。

今晚出战首场的是保加利亚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朝鲜队以五十八比七十一失利。

新华社十五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今晚接见了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公安体育组织第七届男子篮球比赛的各国篮球代表队领队。他们是：阿尔巴尼亚的内斯特德·塔基中校，保加利亚的米米尔·胡格洛夫中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科秋少将，罗马尼亚的尼古拉·基里亚克少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弗朗齐歇克·沃斯特里少校，和中国的龙潜。谢富治副总理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公安部副部长、中国“前卫”体育协会主任杨奇清，国家体委副主任李富荣，社会主义国家公安体育组织第七届男子篮球比赛大会组织委员会主任任马星五等。

接见时，参加这次比赛的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节等也在座。



四月十五日，社会主义国家公安体育组织第七届男子篮球比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幕。

本报记者 蒋 经摄

阿革命化措施结硕果

广大职工掀起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
许多企业超额完成首季度生产计划

新华社地拉那十二日电 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的呼吁书以及党中央公开信的鼓舞下，阿尔巴尼亚许多工人、青年、学生和战士，掀起了一个超额的竞赛，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首都地拉那第一季度的工业生产计划超额完成了百分之二点三，首都其他几个大型工业企业如斯大林纺织联合工厂、恩维尔·霍查纺织厂、阿里·伊米德食品联合工厂以及十一月二十二日建筑公司等单位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恩维尔·霍查纺织厂今年前三个月的产量比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并增加了上月份去依靠进口的新产品。地拉那、普拉特、爱尔巴桑等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企业的绝大部分工厂企业也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

在前三个月的产量比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并增加了上月份去依靠进口的新产品。地拉那、普拉特、爱尔巴桑等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企业的绝大部分工厂企业也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

在前三个月的产量比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并增加了上月份去依靠进口的新产品。地拉那、普拉特、爱尔巴桑等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企业的绝大部分工厂企业也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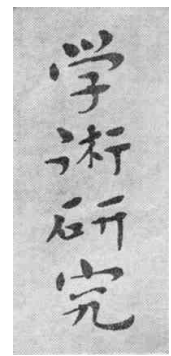
在前三个月的产量比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并增加了上月份去依靠进口的新产品。地拉那、普拉特、爱尔巴桑等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企业的绝大部分工厂企业也都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

罗马尼亚改良土壤工作获成绩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电 罗马尼亚近几年来在改良贫瘠土地和酸性土壤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罗马尼亚农业区登尼亚、加拉茨、多布罗加、克里沙纳等州共有将近三十七万二千公顷的贫瘠土地。为了改造这些土地，罗马尼亚科学工作者采用了加固化和施肥化的办法，大量种植了防风林，利用绿篱青、乙酰胺来固定土壤，并施上粪肥。结果，使在这些土地上种植葡萄和果树取得了好收成，——奥尔登尼亚州这类土地每公顷的葡萄产量达到了六千——一万七千公升。

另外，他们还在二十公顷的酸性地上进行试验，由于施了石灰粉，使每公顷的小麦、玉米产量增加了二百——五百公升。



第一三二期

一、疑问的由来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星宇同志的《论“清官”》,不仅指名地批评了吴晗同志的“清官论”。

同年六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吴晗同志的《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退场了,其中称颂了《论“清官”》是一篇“好文章”,“基本论点”是科学的,正确的,“我都很赞成,并且很高兴”,并认为“这也正好是我的《论海瑞》”一文中的基本论点。我说过的话,这两篇文章加以发挥,我当然很感激。

在一篇庸庸的思想论战中,一篇批评文章,在批评者根本不承认自己有过文章的情况下,却博得了有数文章

基本观点的满口赞颂。这种罕见现象的出现,难道还不够令人奇怪么?难道还不够发人深思么?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励同志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篇在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批评了《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的反动作用,指出了这出戏是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的一个代表作,但是好。但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不仅在许多地方完全采用了星宇同志《论“清官”》中的这个基本理论根据,目前事实上已成了许多“清官论”的主要理论靠山。但是,

如果按照这种“一分为二”来认识地主阶级,那么,由于“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互相对立”,地主阶级内部岂不是就分裂成“法定权利”派和“习惯权利”派或“明哲派”和“坏人派”了么?

如果按照这种“一分为二”去考察地主阶级对封建法律,认为封建法律只反映和维护不超越一定“界限”的统治权利。那么,封建“王法”岂不是变成了专门用来镇压某些地主阶级分子的特权和特权,而不是地主阶级用来维护其阶级的专政工具么?

如果按照这种“一分为二”去看待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那么,由于“法定权利”要维持本身的长期生存,就不能不限制“习惯权利”的活动范围,也不是封建的上层建筑也得分裂成“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两个不同部分了么?

星宇同志的这种所谓“一分为二”,所谓封建统治权利分裂为“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论断,能不能算是革命的辩证法呢?能不能算是揭示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呢?

大家知道,封建法律集中地反映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专政工具。它保障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特权,而不是只维护其中某些集团或个人的利益。同时,它镇压的也只是农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不法行为”;而决不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在封建社会中,“既即国家”。不仅皇帝可以宣称“君要臣死,不得死”;就连一个小小的土豪劣绅地主,也可以私设公堂和监牢,进行所谓“合法”的逼租索债。这些行为究竟算是“法定权利”呢还是“习惯权利”?

封建法律,其实不过是封建政权用立法形式反映的地主阶级意志而已。地主阶级根据剥削和压迫的需要,可以随时把压迫农民的新办法补充进法律中去,也可以随时废除他们认为已经过时或不便的某些条文。实际上,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封建法律也越来越周密、越残酷,给农民套上越来越重的枷锁,给地主阶级带来越来越多的利益。这能说成是“法定权利”对地主阶级“不法行为”的“限制”吗?

我们认为,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封建权利制的特性,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总是迫使封建统治权利走向自己的反面。封建统治阶级越是加强反动的国家机器(包括法律在内),就越引起农民的反抗,越是加速它的反动统治的崩溃。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第二,究竟怎样看待地主阶级的所谓“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

星宇同志认为,“法定权利”体现了地主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习惯权利”则体现了地主阶级特殊的、眼前的利益。“法定权利”对“习惯权利”的“限制”,可以减少人民受到的压迫。

而吴晗同志曾说过:海瑞、况钟等“清官”所以值得“学习”,就因为他们“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

比较这两种说法,在理论上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呢?按照这个观点,所谓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当然是指这个阶级要维持它的反动统治,从一世传到万世。但是,这只是每一次反动阶级的痴心妄想,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既然这样,又怎么能说封建统治反映并实现了这种根本不能实现的虚幻的“长远利益”呢?

难道说,只要地主阶级的压迫不超过封建“王法”许可的“界限”,农民就会心甘情愿地受剥削不起起来造反么?难道说,只要地主阶级的剥削不超过封建“王法”规定的“范围”,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可能从一世延续到万世么?

难道说,“清官”手执的“三尺法”,不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

康立

主要内容:星宇同志的《论“清官”》,是“清官”讨论中出现较早、影响较大的一篇文章。吴晗同志称赞它。很多同志引用它。方励同志也称他对“清官”问题作了一些很好的分析。但是,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如封建社会中存在“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斗争,“清官”由于维护“法定权利”而成为封建制度的一种“自我调节器”等,却不禁引起了我们一连串疑问。现在提出向星宇同志请教,希望能得到明确解答。

第一,究竟怎样看待所谓“封建剥削权利”或“封建的统治权利”?究竟怎样看待封建法律?

星宇同志认为,封建剥削权利可以“一分为二”成“有限制”的法定权利,“无限制”的习惯权利的对立,而封建法律所反映和维护的正是这种“有限制”的统治权利。星宇同志“清官论”中的这个基本理论根据,目前事实上已成了许多“清官论”的主要理论靠山。但是,

如果按照这种“一分为二”来认识地主阶级,那么,由于“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互相对立”,地主阶级内部岂不是就分裂成“法定权利”派和“习惯权利”派或“明哲派”和“坏人派”了么?

如果按照这种“一分为二”去考察地主阶级对封建法律,认为封建法律只反映和维护不超越一定“界限”的统治权利。那么,封建“王法”岂不是变成了专门用来镇压某些地主阶级分子的特权和特权,而不是地主阶级用来维护其阶级的专政工具么?

如果按照这种“一分为二”去看待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那么,由于“法定权利”要维持本身的长期生存,就不能不限制“习惯权利”的活动范围,也不是封建的上层建筑也得分裂成“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两个不同部分了么?

星宇同志的这种所谓“一分为二”,所谓封建统治权利分裂为“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论断,能不能算是革命的辩证法呢?能不能算是揭示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呢?

大家知道,封建法律集中地反映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专政工具。它保障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特权,而不是只维护其中某些集团或个人的利益。同时,它镇压的也只是农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不法行为”;而决不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在封建社会中,“既即国家”。不仅皇帝可以宣称“君要臣死,不得死”;就连一个小小的土豪劣绅地主,也可以私设公堂和监牢,进行所谓“合法”的逼租索债。这些行为究竟算是“法定权利”呢还是“习惯权利”?

封建法律,其实不过是封建政权用立法形式反映的地主阶级意志而已。地主阶级根据剥削和压迫的需要,可以随时把压迫农民的新办法补充进法律中去,也可以随时废除他们认为已经过时或不便的某些条文。实际上,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封建法律也越来越周密、越残酷,给农民套上越来越重的枷锁,给地主阶级带来越来越多的利益。这能说成是“法定权利”对地主阶级“不法行为”的“限制”吗?

我们认为,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封建权利制的特性,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总是迫使封建统治权利走向自己的反面。封建统治阶级越是加强反动的国家机器(包括法律在内),就越引起农民的反抗,越是加速它的反动统治的崩溃。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第二,究竟怎样看待地主阶级的所谓“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

星宇同志认为,“法定权利”体现了地主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习惯权利”则体现了地主阶级特殊的、眼前的利益。“法定权利”对“习惯权利”的“限制”,可以减少人民受到的压迫。

而吴晗同志曾说过:海瑞、况钟等“清官”所以值得“学习”,就因为他们“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

比较这两种说法,在理论上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呢?按照这个观点,所谓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当然是指这个阶级要维持它的反动统治,从一世传到万世。但是,这只是每一次反动阶级的痴心妄想,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既然这样,又怎么能说封建统治反映并实现了这种根本不能实现的虚幻的“长远利益”呢?

难道说,只要地主阶级的压迫不超过封建“王法”许可的“界限”,农民就会心甘情愿地受剥削不起起来造反么?难道说,只要地主阶级的剥削不超过封建“王法”规定的“范围”,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可能从一世延续到万世么?

难道说,“清官”手执的“三尺法”,不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

准备的鞭子么?手执鞭子的主子 and 挨鞭子的奴隶之间,他们的“利益”又怎样“一致”起来呢?难道吃人的和被吃人的可以存在“利益一致”么?

最后,难道可以说,做奴隶,当牛马,满足于稳当当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就是农民的“当前利益”吗?

在阶级斗争对立的阶级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的阶级利益,地主阶级的利益,从长远看还是从当前看,都只能是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地主阶级利益每增长一分,农民阶级的苦难就加重一倍。这难道不是已被无数历史事实证实了的客观真理么?

第三,究竟怎样看待封建官吏的“清”与“贪”?怎样看待“清官”反对豪强权贵的斗争?怎样看待“清官”的“爱民如子”?“清官”在主观上是不是完全真诚?

如果说,为了反对“一概否定”“清官”而一定要把“清官”与地主豪强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清官”反对豪强权贵的斗争是由于他们“对人民群众的苦难流下同情”,那么,由此推论下去,岂非“清官”的“廉洁奉公”,既奉剥削阶级的“公”,又奉被剥削阶级的“公”了吗?“清官”的“清正无私”,岂非既对地主阶级“无私”,又对农民阶级“无私”吗?“清官”所在的衙门、公堂岂非是凌驾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上的全民国家、全民法庭么?

如果说,“清官”的反豪强斗争是为了减轻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那么,“清官”的阶级本质又是什么呢?“清官”与豪强不是生存在同一个地主阶级圈子上的?“清官”不是地主阶级的专政工具?如果承认“清官”是地主阶级的工具,那么,“清官”又怎能起“揭露封建制度的作用”呢?难道他们会自觉地抛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吗?

如果说,“清官”反贪污对人民有利;那么,“清官”反贪污,难道不是为封建国家打算,而是替农民阶级打算?事实证明,“清官”超反贪污,封建国家的钱粮收入也就越多,对劳动农民的剥削搜刮也就越凶。这对农民,又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好处”呢?

如果说,“贪官”头一显露出狰狞本相的恶器,一心要害吞噬所能看得见的一切;那么,“清官”难道就不更像一条美女蛇吗?特别是从“清官”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偶像这一点来看,它正不是起了“贪官”所能起到的欺骗麻痹人民反动作用么?“清官”的“清”,不正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在玩弄反革命的欺骗手段上已经黔驴技穷,而不得不乞灵于暴力镇压么?

如果说,“清官”标榜“爱民”,主观上可能是真诚的。那么,世界上难道可能存在着什么“超阶级的爱”么?星宇同志既然承认“清官”的“爱民”无非是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劳动农民的需要和对残酷剥削的伪装,为何又说什么“清官”的“爱民”在“主观上可能是真诚的”,岂非自相矛盾了吗?

我们认为,要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按照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所指出的,“一切剥削阶级,都要剥削与压迫被剥削者,都要互相争夺被剥削者的剩余生产物或剩余价值;因此,就造成一切剥削者的剥削性,对于人的压迫性及互相争夺性。”“清官”的压仰豪强及反贪污等,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互相争夺剥削剩余的一场闹剧,而“清官”则不过是这场闹剧中戴着假面具的一个丑二丑(即小丑花脸)罢了。假认为,这样的解释便是“对复杂历史过程过分简单化的看法”,那么,是不是竟认为需要在人民的革命功劳簿上替这些骗子手记上一大功呢?

第四,“清官”是封建制度的一种“自我调节器”吗?

在《论“清官”》中星宇同志曾创造了一种“新奇”的提法:“包拯、海瑞之类的‘清官’实际上是封建制度在矛盾尖锐化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节器。”并且说:“按治级中的‘清官’在人民中传颂开来的根据就在于此。”

这个“自我调节器”究竟是什么东西,恐怕谁也没见过。听说有点神闻,能够根据水位的涨落和流水压力的大小自动控制闸门,这大概就是一种“自我调节器”吧。不是吗?“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泛滥了,超过了“法定权利”的“限度”,引起了人民的“反抗激流滔涌高涨”;于是就放出了几个“清官”,在局部地区和局部范围内,改革弊政,平反冤狱,减轻赋税,救济灾荒,约束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以“抑制制度而出现的习惯权利

斗争,从而进一步突出了海瑞“处处奉公为人民”,甚至于“不顾杀身之祸”也要为人民“退田”、“除霸”的“英雄”品质。

从末定稿到最后的本子,有关“退田”和“除霸”的改写,是作者运用资产阶级观点,彻底歪曲历史的过程。也就是海瑞由地主阶级忠臣被“改造”为人民“救星”的过程。

消极的“罢官”变成了积极的“罢官”

关于“罢官”部分的修改,作者的调停同情和一般愤慨,却化为力量,为那些“罢官”的“英雄”,狂大地鼓噪,拼命地打气,鼓励他们不要“灰心丧气”,“失败了再干”要坚持到底!

历史上的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〇年春任应天巡抚的。他只呆了短短的几个月,就被他的政敌罢掉了。当时这个官场混了半生的老官僚,所做所想,也不过是汲汲于个人安危的“明哲保身”或“激流勇退”。他一再上当时的内阁,要求回海南岛养老。何曾有一丝丝的“为人民”的想法!就为吴晗同志美化了的所谓“刚直不阿,不为强暴屈服,不为权势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云云,也同樣找不到半点影子!有的却是灰心丧气,而且准备“夹着尾巴逃跑”的失败情绪。总之,历史上的海瑞是灰溜溜地罢官而去的。

吴晗同志曾曲曲不休地大谈历史事实。而《海瑞罢官》起初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两个本末定稿中,作者确实是把“罢官”的“英雄”给予无限同情,对那些“英雄”做不成官的社会充满仇恨。吴晗同志不惜借剧中人物之口,露骨地发出:“这年头,越是好官,越要罢官。”在“送别”一场里,让群众高喊叫喊:“不要敬重抚,还我海瑞!”他借海瑞的口无可奈何地叹息:“才不明主弃,多病致人疏。”已经失败了,怎

么办呢?只好先隐藏起来,于是借海瑞之口对众人说:“赶快回家,躲藏几年,不可冒失,闯出来。”海瑞自己则表示:“罢官归去耕林下,何日再来拜庭座?”吴晗同志期待着社会主义的山倾覆,要了党的“英雄”卷土重来。在这里吴晗同志倾注了感情,发泄了仇恨,甚至,也骂了骂。但是有一点,他似乎并没能掩盖住那些反社会主义“英雄”的失败情绪。

吴晗同志是绝不甘心让他深恶痛绝的“罢官”的“英雄”,这样灰溜溜地走掉。末定稿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罢官”的消极低沉情绪,在改定出版的本子里被一扫而光,代之以一种积极高亢的调子。历史上的那个灰溜溜的失败性格,被描绘成了叱咤风云的盖世英雄。在“罢官”一场里,海瑞喊大骂徐阶和新任巡抚戴凤翔,“你纵欲使奸巧大害国殃民”,“却难道王民恨何处难消?我海瑞去乌纱巾离开朝,有一日再回官堂重整纲纪。”你看,这个野心勃勃的“罢官”的“英雄”,表示了对重来的决心。尤其惊人的是:在即将交出巡抚大印的那一刻,海瑞当机立断,终于表示了恶霸徐阶和官宦王明友,为苏松地区的老百姓除了大害,从而取得了“退田”、“除霸”的圆满成功。由于改写的海瑞具有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再加上竟激烈的“除霸”胜利场面,这就完全掩盖了消极反动的失败情绪。于是,消极的“罢官”变成了积极的“罢官”,鼓舞那些“罢官”的“英雄”,“罢官不,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丢海南山再战的目的达到了。过去的两个未定稿之所以题作《海瑞罢官》,看来是“罢官”的题还没有完成;最后的本子,“罢官”的调子唱足了,于是题改为《海瑞罢官》。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个点睛之笔。否则,是有作者一番苦心的!

剧本的改动是为了进一步反党反社会主义

吴晗同志“破门而出”,不惜七次易稿,呕心

的逆流狂涛!”

历史事实真是这样吗?作为反动剥削阶级之一的地主阶级,能够掌握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吗?阶级斗争的发展会听从反动阶级的指挥和调遣吗?地主阶级能自动地调节和控制封建社会的各项矛盾吗?如果说,“清官”是一种“自我调节器”,那究竟能调节什么矛盾呢?是调节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吗?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无时无刻不在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就必然激起农民阶级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清官”又怎样来调节这种根本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呢?是调节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吗?地主阶级内部兼并斗争、损人利己的本性决定了地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争夺剥削果实、土地斗争,永远不会有片刻的停止。而且,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清官”从就是这种狗咬狗斗争中的一头恶狗。在这种情况下,“清官”究竟能调节什么社会矛盾,究竟算哪一门的“自我调节器”呢?

第五、究竟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星宇同志把封建统治权利分为“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提法,据说系引自马克思在一八四二年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但据我所知,马克思的这篇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论文,原是用来反对德国普鲁森议会党对穷苦农民的残酷掠夺性态度的。为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马克思曾在文中运用了现成的资产阶级法学语言,其中也包括“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名词在内。当时,马克思尽管还只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但已经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法定权利”与“习惯权利”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从而揭露了资产阶级法权的虚伪性。而当马克思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之后,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等经典著作中,便曾完整地阐述了国家机器学说,明确地指出了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为什么星宇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观点摘章取义,不加以细察,却对马克思早期著作有着那么高的兴趣呢?为什么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提法,而星宇同志却偏要去强调什么“法定权利”对“习惯权利”的“限制”呢?

总之,星宇同志不仅肯定“清官”是一种“实际政治现象”,并且还肯定“清官”是“被对立的阶级所共同称赞的”。这岂不是等于说,“清官”是历史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对立阶级共同的政权代表吗?“清官”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反映了对立阶级的共同利益吗?这种论调,又怎样和吴晗同志的阶级调和论混淆呢?能不能算是一种“一分为二”呢?究竟是辩证法呢还是折中主义?

三、质疑后有感

“清官”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怎样认识反动国家机器本质的问题。

毛主席指出:“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主席又指出:“军阀、官僚、士大夫、奸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这是对国家机关,对包括“清官”、“贪官”在内的一切封建官吏的最深刻的揭露。如何认识国家机器的本质,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机会主义者争论的课题。请看一看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他把对统治的单一解释为“坏的”和“好的”两方面的机械混合,从而从历史上就抹杀资本主义“坏”方面,建立所谓“好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批评了这种折中主义和阶级调和论的主张说:“他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作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范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六页)请再重新温习一下大家熟悉的考茨基的“第二”“名言”。他说:“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甚至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也有共同利益。主人入了,奴隶也要被毁灭,奴隶死了,主人就要受损失。这种一对一的利害一致并排斥任何一方的长期的对立。”(《论经济学的影响》,一九一五年)在今天的苏联资本主义者的著作中,更是大量地出现了这种奇谈怪论。例如,一九九九年,在法国曾出版了一本探讨现代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法权危机的书,其中就曾经大谈什么“法制的统治一方面加强了资产阶级,它方面又限制了资产阶级的发展”;宣称“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任何法律规范都起着反动的作用,这样一种观点太简单化了”;并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中的许多“规范使人民群众在长期顽强斗争中迫使统治阶级作出政治让步固定下来”,等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出现过这种机会主义思潮,是一面很坏的历史镜子。它告诉了人们,如果不是坚持彻底的革命批判精神,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社会历史现象,就必然会滑到折中主义和阶级调和论的泥潭里去。因此,尽管星宇同志站在反对吴晗同志的“清官论”的盟原出发,但若是不能彻底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和一切机会主义划清界限的话,就会走到自己愿意的反面去。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号称“海瑞”是“忍冬科植物”的平心先生,竟如获至宝地把星宇同志关于“清官”的论点当成一面镜子自己的脏脸,自以为躲在这块盾牌后面,可以万无一失地向人们抛起恶毒的子弹,进行刻毒的谩骂。这种恶毒的出现,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么?我们每一个愿为捍卫无产阶级纯洁性而斗争的同志警悟和深思么?

(原载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文汇报》)

从《海瑞罢官》几个稿本的比较看它的反动本质

杨金亭

为了进一步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我们找到了这个剧本的两个未定稿:一个题名《海瑞》,是一九六〇年三月的铅印本;另一个也题名《海瑞》,是一九六〇年六月的油印本。我们仔细地阅读和研究了这两个稿本,发现这两个本子的戏剧高潮都是“罢官”。作者为剧本明确规定并贯穿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主题也是“罢官”。看来,通过对历史上上海海瑞事件的描写和歌颂,为那些“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鸣冤,抱不平,并进而为他们的反动活动,唱赞歌,这正是《海瑞罢官》借古讽今的鼓动主题。

比较三个本子,确有所谓“重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并不是象吴晗同志所说的,是什么主题由“退田”改做“除霸”等等,而是关于“退田”和“除霸”所引起起的“罢官”的主题逐渐消失,这是吴晗同志企图调整他的“借古讽今”的枪口,使之发挥更大的战斗力的过程。

从末定稿到最后的本子,较大的改动有两个,一个是关于“退田”和“除霸”的改动,一个是关于“罢官”的改动。

“退田”、“除霸”的改动是为了进一步突出“罢官”的主题

吴晗同志清楚地知道:要塑造一个“罢官”的“英雄”,而且更要引起人们对这个“英雄”的同情,并进而为他的遭遇抱不平,就必须突出这个“英雄”所建树的“事业”,是和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的。“退田”和“除霸”的改动,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要求进行的。

两个未定稿描写“退田”所用的笔墨,比较最后的本子要多得多。比如作者写乡官田造田造:“民穷财尽国事坏,如此江山不久长!”因此海瑞主张:“要使贫民有田可种,就要乡官退田。”他进而愤慨地表示:“非退田不足以平民愤,非退田不足以解民困,非退田不足以消仇恨,非退田不足以表明光明!”在这里吴晗同志叫喊:“退田”可以算是相当猖狂了,明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你们已经有了“仇恨”,再不“退田”,“江山就不久长”了,也许是他自己感到这样说太露骨了吧,篇幅都是“退田”,“退田”,在牛鬼蛇神叫喊一阵“退田”黑风的一九六一年,采取这种赤裸裸的鼓吹,无异于自取灭亡。这显然是很不策略的。而且,对“退田”的描写,从吴晗同志称呼海瑞的“农民立地”和人民的“救星”的称号的高度要求来,也还有不满足之处而进行改写:

第一,“退田”的叫嚣改得隐晦一些,以免自取灭亡。

第二,完全删除了末定稿中,海瑞在“退田”的行动上,所表现出来的“报上恩、酬知己”的个人杂念,加进了“今日眼见见到青天,刘耕籍重获田园,有土地何愁荒废,好光景就在眼前”,使为人民“退田”的目的,得到了彻底的净化和进一步的突出。

第三,霸占农田田产、横行不法的堂堂乡明府公子徐瑞,和支势乡官霸占农田田产的贪官王明友,终于被杀绝法。这样,“退田”的成果也有了保障。

更重要的是,通过“除霸”的场面,把由“退田”所引起的戏剧矛盾,推向高潮,让海瑞有机会和徐阶、戴凤翔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吴晗同志曾曲曲不休地大谈历史事实。而《海瑞罢官》起初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两个本末定稿中,作者确实是把“罢官”的“英雄”给予无限同情,对那些“英雄”做不成官的社会充满仇恨。吴晗同志不惜借剧中人物之口,露骨地发出:“这年头,越是好官,越要罢官。”在“送别”一场里,让群众高喊叫喊:“不要敬重抚,还我海瑞!”他借海瑞的口无可奈何地叹息:“才不明主弃,多病致人疏。”已经失败了,怎

么办呢?只好先隐藏起来,于是借海瑞之口对众人说:“赶快回家,躲藏几年,不可冒失,闯出来。”海瑞自己则表示:“罢官归去耕林下,何日再来拜庭座?”吴晗同志期待着社会主义的山倾覆,要了党的“英雄”卷土重来。在这里吴晗同志倾注了感情,发泄了仇恨,甚至,也骂了骂。但是有一点,他似乎并没能掩盖住那些反社会主义“英雄”的失败情绪。

吴晗同志是绝不甘心让他深恶痛绝的“罢官”的“英雄”,这样灰溜溜地走掉。末定稿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罢官”的消极低沉情绪,在改定出版的本子里被一扫而光,代之以一种积极高亢的调子。历史上的那个灰溜溜的失败性格,被描绘成了叱咤风云的盖世英雄。在“罢官”一场里,海瑞喊大骂徐阶和新任巡抚戴凤翔,“你纵欲使奸巧大害国殃民”,“却难道王民恨何处难消?我海瑞去乌纱巾离开朝,有一日再回官堂重整纲纪。”你看,这个野心勃勃的“罢官”的“英雄”,表示了对重来的决心。尤其惊人的是:在即将交出巡抚大印的那一刻,海瑞当机立断,终于表示了恶霸徐阶和官宦王明友,为苏松地区的老百姓除了大害,从而取得了“退田”、“除霸”的圆满成功。由于改写的海瑞具有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再加上竟激烈的“除霸”胜利场面,这就完全掩盖了消极反动的失败情绪。于是,消极的“罢官”变成了积极的“罢官”,鼓舞那些“罢官”的“英雄”,“罢官不,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丢海南山再战的目的达到了。过去的两个未定稿之所以题作《海瑞罢官》,看来是“罢官”的题还没有完成;最后的本子,“罢官”的调子唱足了,于是题改为《海瑞罢官》。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个点睛之笔。否则,是有作者一番苦心的!

剧本的改动是为了进一步反党反社会主义

吴晗同志“破门而出”,不惜七次易稿,呕心

的逆流狂涛!”

